

武俠文化

易劍東◎著

孟樊◎策劃



文化手邊冊 54

Chivalrous Culture

武俠文化

Chivalrous Culture

易劍東／著

孟 樊／策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武俠文化 / 易劍東著. -- 初版. -- 台北市：
揚智文化，2000[民 89]
面； 公分. -- (文化手邊冊；54)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818-186-8 (平裝)

1. 武俠小說 - 作品研究

857.9

89012130

出版緣起

社會如同個人，個人的知識涵養如何，正可以表現出他有多少的「文化水平」（大陸的用語）；同理，一個社會到底擁有多少「文化水平」，亦可以從它的組成分子的知識能力上窺知。眾所皆知，經濟蓬勃發展，物價生活改善，並不必然意味著這樣的社會在「文化水平」上也跟著成比例的水漲船高，以台灣社會目前在這方面的表現上來看，就是這種說法的最佳實例，正因為如此，才令有識之士憂心。

這便是我們——特別是站在一個出版者的立場——所要擔憂的問題：「經濟的富裕是否也使台灣人民的知識能力隨之提升了？」答案

恐怕是不太樂觀的。正因為如此，像《文化手邊冊》這樣的叢書才值得出版，也應該受到重視。蓋一個社會的「文化水平」既然可以從其成員的知識能力（廣而言之，還包括文藝涵養）上測知，而決定社會成員的知識能力及文藝涵養兩項至為重要的因素，厥為成員亦即民眾的閱讀習慣以及出版（書報雜誌）的質與量，這兩項因素雖互為影響，但顯然後者實居主動的角色，換言之，一個社會的出版事業發達與否，以及它在出版質量上的成績如何，間接影響到它的「文化水平」的表現。

那麼我們要繼續追問的是：我們的出版業究竟繳出了什麼樣的成績單？以圖書出版來講，我們到底出版了那些書？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如前一樣也不怎麼樂觀。近年來的圖書出版業，受到市場的影響，逐利風氣甚盛，出版量雖然年年爬升，但出版的品質卻令人操心；有鑑於此，一些出版同業為了改善出版圖書的品質，進而提昇國人的知識能力，近幾年內前後也陸續推出不少性屬「硬調」的理論叢

書。

這些理論叢書的出現，配合國內日益改革與開放的步調，的確令人一新耳目，亦有助於讀書風氣的改善。然而，細察這些「硬調」書籍的出版與流傳，其中存在著不少問題。首先，這些書絕大多數都屬「舶來品」，不是從歐美「進口」，便是自日本飄洋過海而來，換言之，這些書多半是西書的譯著。其次，這些書亦多屬「大部頭」著作，雖是經典名著，長篇累牘，則難以卒睹。由於不是國人的著作的關係，便會產生下列三種狀況：其一，譯筆式的行文，讀來頗有不暢之感，增加瞭解上的難度；其二，書中闡述的內容，來自於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如果國人對西方（日本）的背景知識不夠的話，也會使閱讀的困難度增加不少；其三，書的選題不盡然切合本地讀者的需要，自然也難以引起適度的關注。至於長篇累牘的「大部頭」著作，則嚇走了原本有心一讀的讀者，更不適合作為提昇國人知識能力的敲門磚。

基於此故，始有《文化手邊冊》叢書出版之議，希望藉此叢書的出版，能提昇國人的知識能力，並改善淺薄的讀書風氣，而其初衷即針對上述諸項缺失而發，一來這些書文字精簡扼要，每本約在六至七萬字之間，不對一般讀者形成龐大的閱讀壓力，期能以言簡意賅的寫作方式，提綱挈領地將一門知識、一種概念或某一現象（運動）介紹給國人，打開知識進階的大門；二來叢書的選題乃依據國人的需要而設計，切合本地讀者的胃口，也兼顧到中西不同背景的差異；三來這些書原則上均由本國學者專家親自執筆，可避免譯筆的詰屈聱牙，文字通曉流暢，可讀性高。更因為它以手冊型的小開本方式推出，便於攜帶，可當案頭書讀，可當床頭書看，亦可隨手攜帶瀏覽。從另一方面看，《文化手邊冊》可以視為某類型的專業辭典或百科全書式的分冊導讀。

我們不諱言這套集結國人心血結晶的叢書本身所具備的使命感，企盼不管是有心還是無心的讀者，都能來「一親她的芳澤」，進而藉

此提昇台灣社會的「文化水平」，在經濟長足發展之餘，在生活條件改善之餘，國民所得逐日上昇之餘，能因國人「文化水平」的提昇，而洗雪洋人對我們「富裕的貧窮」及「貪婪之島」之譏。無論如何，《文化手邊冊》是屬於你和我的。

孟樊

一九九三年二月於台北

序

武俠是一種中國特有的歷史和文化現象，它承載的是中國武術文化，體現的是中國倫理和道德文化。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武俠已經逐漸內化成為一種特有的精神寄託。無論是熟讀史書的學者，還是目不識丁的農民，他們的心目中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留有我們祖先的武風俠骨。雖然武功和俠客在當今社會已經逐漸失去了其生存和發展的環境，但是，讓自己擁有過人的武藝和企盼有大俠解救臨危受困的自己，依然是中國人心頭揮之不去的情結。

如同武術本身的攻防搏鬥原則、內外兼修特點、宗派門戶色彩是中國人特有的文化產物

一樣，依託武術產生的武俠文化也是中國人創造的一種特殊的文化類型。

從原始武術產生所需要的攻擊性本能和勇健性格時起，武和俠的文化基因就已經孕育了。此後，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風雲中孕育了一個獨特的階層——「士」。武俠就在他們當中產生了。雖然今天對於俠出於儒家還是出於墨家還存有爭議，但武俠產生於春秋時期是基本得到公認的。可以說，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需要俠客並且產生了俠客的時代。武俠在當時的時代風雲中經受了戰爭和政治的淘洗，逐步奠定了自身在中國武術和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經過先秦游俠到兩漢豪俠，隋唐隱俠到宋明義俠的演變，中國古代武俠走過了二千多年的曲折歷程，也留下了許多值得今人追思的文化命題。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大陸在八〇年代以前並不提倡以搏鬥為目的的武術，武術社團和武俠小說也處於有節制的發展狀況，武俠影視更是幾乎湮沒。此時，香港、台灣的武俠

文化傳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集中體現在武俠小說和影視成為大眾娛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文化媒體也部分地傳播到了中國大陸，為中國大陸武俠文化傳播的興盛提供了條件。一九八二年，電影《少林寺》在中國大陸全面放映，立刻掀起了一場觀武演武、習武教武、研武講武的熱潮。在這個熱潮中，有關武俠文化的學術作品種類較多，為我們考查中國古代武俠文化和現代中國人的尚武心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這些書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類：武俠小說評價類、武俠文學歷史類、武俠歷史源流類、武俠人物介紹類、武俠影視評價類。陳墨有關武俠小說的評論著述豐厚，影響很大；徐斯年有關中國武俠小說史論的成果引人注目；陳山和汪涌豪等有關中國武俠歷史的著作揭示了中國武俠的源流；王立和蕭放等有關中國古代俠客的介紹描述了中國武俠的典型人物事跡；陳墨撰寫的中國大陸目前唯一的武俠影視評論《刀光劍影蒙太奇——中國武俠電影論》堪稱

一部佳作。上述作品大多是九〇年代以後出版的，而且目前仍呈現上升的態勢。它本身也成爲一種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其突出特點是，多數作品只是從武俠文化的某一面進行探討，並且較少與當前的現實作有機聯繫。這種狀況使得人們對於武俠文化的整體狀況難以了解，對武俠文化的現實意義也不易明瞭。直接影響到武俠文化精髓的發揚光大和武俠文化負面因素的消除。

蕭放主編的《中國古代俠客百例》以時間先後爲線索，重點描述了中國古代著名俠客的事跡，爲我們展現了一幅中國古代俠客的全景圖，許多描述細致入微，形象生動，對於人們了解中國古代俠客的行爲特徵具有重要價值。但該書以傳奇爲例展開論述，有些內容與歷史事實存在一定偏差，需經詳盡考證才能採信。

王立撰寫的《中國古代豪俠義士》一書則沒有拘泥於俠客個案的描述，而是從整體上對俠客進行了探討，作者對作爲歷史和文學現象的「俠」進行了深入分析，從俠與劍、俠的武

德、俠與盜、女俠及俠之婦女觀、俠與酒氣、俠的負面、俠與功業理想諸方面進行了理論探索，為人們提供了武俠行為的一般模式；其中對武俠現象的中國文化背景的揭示還需要加強。

徐斯年的《俠的蹤跡——中國武俠小說史論》對武俠小說的歷史進行了梳理，並分析了幾個典型個案，為人們展示了中國武俠小說的發展歷程。其不足之處是歷史過程的描述還不夠詳盡和細致，武俠小說歷史規律的揭示還有待深入。

汪涌豪的《中國游俠史》是有關武俠歷史的一部較為全面深刻的專著，作者既對游俠的一般歷史規律作了揭示，又從游俠的社會關係、活動方式、人格特徵、存在意義作了深刻闡釋，還將游俠與歐洲騎士、日本武士作了文化學意義的比較，具有歷史的縱深感和貫穿感，揭示了武俠文化的深刻內涵。

上述諸書都是從武俠文化的某一個或幾個面向進行闡述，為人們提供了各不相同的武俠

文化的發展景象，但難以形成人們對武俠文化的整體和宏觀的認識。應該說，作為整體的武俠文化在上述書籍中都無法得到全面闡釋。

只有一九九五年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了由董躍忠撰寫的《武俠文化》一書，對武俠文化作了較為全面的描述，也實際進行了一些分析。但是，可能由於對武俠文化的理解不夠全面，該書沒有論及武俠武功和武俠影視，也沒有分析武俠產生和發展的社會歷史原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在當前社會情感和心智面臨轉型以及社會思想多元化的時代，武俠作為人們心底的一種具有超越意義的象徵，依然有著極強的現實感召力。古代武俠的行為方式、人格特徵至今仍然讓現代人心馳神往。武俠小說作為一種成年人的「童話」、武俠影視作為一種青少年的「遊戲」，在今天的中國乃至全世界，仍然散發著迷人的風采，牽繫和導引著無數真誠而善良的人們。這種現象本身也因其持續時間長遠、輻射領域寬廣、影響程度深刻而引起了越來越

多的研究者的注意。

筆者原本與武術和武俠沒有任何淵源，但當了解到自己所出生和成長的江西省豐城市號稱「劍邑」，市直屬鎮號稱「劍光鎮」時，筆者的心靈受到了震撼。在了解到晉朝歷史上有關龍泉、太阿寶劍落戶豐城的神話典故之後，筆者的心頭更油然而生一種衝動。在這種衝動的刺激下，當我準備碩士學位論文時，中國近代武術成為我選定的研究課題，並從此確立了我目前的主要研究領域——中國武術文化。劍俠、劍氣、劍膽作為武文化的重要內容已經內化於我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我的姓名中的「劍」字也或多或少促使我在武俠精神的感召下生活著。

當今的中國大陸，社會經濟已經與古代中國不可同日而語，但社會環境在某種程度上卻存在某些「暗合」。古代的鏢行是以鏢師為主體的，今天的保全業是建立在保安基礎上的，這兩者都是需要身體防護和搏鬥技能的，鏢師和保全在自己所處的社會都扮演著技能超出常

人、毅力和心智勝出普通人的社會正義的保護者角色。他們之間是否存在著武風和俠骨的傳承關係呢？社會治安的維護從來都不僅僅是由國家權力機關來維護的，它總是需要普通大眾具備面對不良侵害時的應對能力。這個規律已經被我們身邊的無數事實所印證。這其中是否能激起我們對古代俠客所具有的無所畏懼的強者心態的呼喚呢？

歷史常有驚人的相似，但這個道理常常在活生生的現實面前被人們所忽略和曲解。在我們重新梳理中國武俠文化的各個面向時，我們不能不再次提出這樣一個永恆的命題。我們每個人都有意或無意、自覺或不自覺地在踐行著前人的路，我們也存在諸多自身無法擺脫的歷史慣性。這其中，浸潤著我們祖先優異特質的許多智慧、情感是尤其需要我們珍視的。今天重新拾起武俠文化這個看似離我們遙遠的話題，正是為了讓人們在歷史和文化的薰陶下思索我們的現實。從而在自己的行為方式和情感歸屬、思想傾向諸方面整理出適應時代的理路

和模式來。

古語曰：「大象無行、大音稀聲」；又言：「大道不器」。

筆者不希望自己對武俠文化的闡述讓讀者無從把握，也不想讓讀者停留在僅僅緬懷古人的武風和俠骨上。

從這個意義上看，筆者的這本《武俠文化》倒願意充當一個小器，有些小用。

易劍東